

10.08

泰兴文史资料

5

88



泰兴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泰兴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在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从事中等教育工作

六年的回忆.....	李学民 (1)
悼念八百烈士.....	戴秉诚 (35)
纪念刘伯厚老师百岁诞辰.....	戴秉诚 (40)
日寇在泰兴的暴行.....	叶秀中 (43)
怀念赵友琴老师.....	戚璠璋 (48)
晚清时期泰兴的一任知县——龙璋.....	叶秀中 (60)
金弼先生事略.....	黄冠南 (65)
祖父金弼二、三事.....	金瑾同 金瑾乐 (71)
金弼轶闻.....	王以庄 (81)
浅谈长江泰兴段.....	殷宝书 (83)
闲话老龙河.....	殷宝书 (90)
县城古迹拾遗.....	翁家藩 郑玉龙 (95)
丁氏义庄往事回顾.....	杨懋青 (103)
泰兴江海公司始末.....	唐国瑞 刘亚平 (110)
漫话黄桥烧饼.....	泰兴县商业局商史办饮服公司 (119)
泰兴国药业炮制“全鹿丸”的过程.....	唐国瑞 刘亚平 (123)
口岸港的过俄运输业.....	李斌存 何尔富 (126)
我在广陵典当二十二年.....	张浚清 (132)

在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 从事中等教育工作六年的回忆

李学民

这里写的已是四十年代的往事了。回想起过去的情景，对革命的向往，是那样的纯真无邪；领导、同志、同事之间是那样的亲密无间。抚今追昔，令人不胜感慨。如今，重温往事，对于激励余生，是不无裨益的。

我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从投身革命洪流，到一九四六年底北撤到台北，时间不到六年，但在这短暂的岁月里，激浊扬清，从黑暗走向光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却跨过了两个历史时期。当时的学校生活，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斗争，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风雷激荡，气象万千。如今虽事隔四十多年，有几个难忘的片断仍然记忆犹新。

泰兴县中的新生

人们都说泰兴是教育事业很发达的地方，但在抗日战争以前，全县也不过两所初级中学。一是泰兴县立初中，一是私立黄桥初中。一九三九年夏，日军在泰兴城里投下了两颗炸弹，吓坏了城里浑浑噩噩、争名夺利的国民党大小党

政头目。这年秋季开学前，县中校长林蔚岑，就把学校从城里搬到北乡六区的樊家堡办理。一九四〇年夏，新四军东进了，泰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党组织也由秘密状态转到公开活动。群众迅速被发动起来，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这所地处泰兴北部农村、头顶着“正统”帽子的县立初中，何去何从，面临着最后的抉择。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我党我军，盘踞在城里的敌伪以及逃到兴化去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敌府，都在影响和争取这所学校。一九四一年夏，林蔚岑辞职不干了，张人俊以国民党泰兴县教育局长的身份亲自担任校长职务。他请来刘锡康当教导主任，我也应聘到校任教，担任初中文史课程。张振玉原来就在县中，她教代数课兼任图书管理员，也留下来了。

新班子搭起来后，便办理招生，准备开学。忽然传来了张人俊被城里的汉奸头子蔡鑫元逮捕的消息，大家将信将疑。不几天张人俊回来了，他回校是向我们告别去上海的。敌人逮捕了他，要他接受三个条件：1.交出教育局的学田租簿租册；2.把县中的校产校具从乡下运送到城里来；3.到城里的延令中学来做校长。张人俊尽管是一个国民党员，毕业于蒋介石兼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但他是爱国的，是讲民族气节的，坚决拒绝了敌人的要求。由于他是已故国民党江苏省执行委员张公任的弟弟，敌人也留了后步，于是由顾凤山（原张公任的部属，时已投靠蔡鑫元，一九四五年光复泰兴城时被俘后被镇压）出面具保，把他释放了。

张人俊的逮捕，是泰兴的国民党党棍、中统分子朱路九一手策划的。当时朱路九是蔡鑫元的“参议”、国特俱乐部“鼎盛公司”的经理，公开打着国民党中央党部教育督导员的旗

号，蟠伏在敌人的卵翼下（位于城北一、二里的燕头）。和城里的敌伪串通一气，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当林蔚岑辞去校长职务的时候，朱路九就要张人俊把他儿子朱剑华弄去做校长，遭到张人俊的拒绝。如今张人俊自己接办了这所学校，朱贼心不死，一不做二不休，借泰兴汉奸头子蔡鑫元的血手把他捉起来，要他乖乖地把学校交出来。当时的张人俊，既不愿当汉奸，又有“正统”观念，和国民党的韩德勤政府藕断丝连，这次和朱路九闹翻了，在泰兴凭他一个光杆子教育局长，有什么资本和这帮家伙较量？结果张人俊让步了，他一走了之。

一九四一年九月，学校开学不久，新校长朱剑华到校了，他来当校长，就意味着学校改变颜色，我们何去何从，不能不认真对待。我和张振玉还有刘锡康三个人秘密商量，一致意见，脱离学校，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参加革命工作。途径是由刘锡康去找县长杜干全，我去找小学同学谢克西（当时谢是县委书记）。

我们分头去找党政领导同志，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不同意我们马上离开。杜干全同志对刘锡康说：“你一个人来了，把你的学校也带过来岂不更好？”当我见到谢克西同志，向他提出工作要求时，他高兴地说：“新四军东进以后，我们就期待着你早些参加工作；可现在，我又不赞成你离开学校了。”他接着说：“敌人在和我们争夺学校，争夺青年学生，我们不能把学校给敌人搞了去……你们几个人这时留在学校比出来参加工作作用更大。……现在，我们要派人进去还派不进呢！”没几天，县委把我们找去，要求抢在敌人的前面，先发制人，迅速发动群众，把学校搬到根据地来（当

时学校所在地樊家堡是游击区，距敌人据点较近），争取更多的教师、学生到革命队伍里来。县委的决定给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认为学校广大师生尽管程度不同地受着“正统”观念的桎梏和影响，但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抗日的，驱逐汉奸朱剑华，反对伪化教育，把学校搬到根据地接受抗日民主教育，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做好工作，广大师生和家长是会积极拥护的。于是，我们三个人商定，刘锡康是教导主任兼简师班的主任，有一定的号召力量，由他抓总，负责做教师和简师班的发动工作；我和张振玉根据任课班级分别负责做六个初中班的学生工作。刘锡康还负责和民主政府联系，我负责宣传品的起草，张振玉负责印刷和保管。当时我们虽都不是共产党员，而我们三人，俨然成为一个领导这次“起义”的核心小组了。

“你们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记住了县委的这一指示，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辛亥革命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通过开庆祝会、教唱歌、出墙报等形式，进行时事政治教育；我们利用学生中的兄弟会组织进行个别串联，了解各人的政治态度，培养积极分子；我们组织了“七七版画社”团结进步学生，发展进步势力；我们还搜集了朱剑华打击进步学生，排挤前任校长，勾结敌伪，妄图把学校劫持到敌方去的种种罪行，搞了一个《朱剑华十大罪状》的油印传单，起草了《告全校师生和家长书》，宣传党的团结抗战的正确主张，揭露敌人的阴谋，号召全体师生和学生家长，行动起来，驱朱护校，把学校迁移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在这期间，民主政府的文教科长居起同志多次深夜来校了解情况，传达县委指示，部署工作。最后和我们约定：一、十月二十日（这天是星期一）

上午八时在全体师生集会举行纪念周时采取行动；二、由县、区领导人出面找朱剑华谈话，县、区同志到达时，以打乱钟为号；三、由六区区长谢邦佐同志负责组织当地群众，协助师生搬迁学校；四、搬迁地点暂定宣家堡东的刘家荡。

行动的时刻来到了。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每周一次的纪念周正在进行，朱剑华的“训话”已经开场。按原定计划，只待县、区领导同志一到，就采取行动。会场气氛很紧张，积极分子们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朱剑华十大罪状》的传单，已经贴上了墙。眼看周会就要收场，负责敲钟的同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几次溜到庄头上去张望，但总是看不见县、区领导同志的踪影。忽然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枪声，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来了来了。“起义”的钟声响了，

“打倒朱剑华！”“要求抗日民主政府接管我们的学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此伏彼起。会场顿时沸腾起来，这时县文教科长居起、六区区长谢邦佐带领着区队（区游击连）赶到了。谢邦佐同志一到，就高声喊道：“老李，你们等急了吧！我们已经打了一仗了。”原来，在他们来校途中，和从大酒庄出洞的伪军相遇，打了一场遭遇战，他们带着区队把那群黄狗赶跑了。

朱剑华在两个学生带领下，到校长室去见县、区负责同志。居起同志向他宣布：抗日民主政府应全校师生的要求，决定接管学校，要他好好办理移交，不得违抗。为了防止朱剑华破坏交接事宜，新成立的以居起、谢邦佐为首的护校委员会决定，暂时把朱交给两个学生看管起来。

大会重新召开，学生会长主持了会议，他揭露了朱剑华勾结敌伪篡夺学校领导权的罪行，代表全校师生要求抗日民

主政府接管学校，居起同志宣布民主政府的决定，希望全校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泰兴县中办成一个革命的为抗战建国培养人才的新型学校。会议结束，正当群情振奋，欢庆胜利的时刻，群众中出现一阵骚动，有的说敌人到了张家河了，有的说孔家桥的敌人到了庄头上了。“当！当！当！”乱钟声又响了，这是学生中的一个坏家伙干的，他胡说鬼子进庄了。两个看管朱剑华的学生吓跑了，朱剑华也象一条丧家之犬，灰溜溜地逃走了。

朱剑华逃走后，为防止他和城里的伪军勾结进行反扑，护校委员会决定连夜搬迁学校。在谢邦佐同志的亲自带领下，当夜，上百名的农民来了，还找来了两条大船，水陆两路，齐头并进。撑船的，背纤的，推车的，挑担的，照来攘往，热闹非凡。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尽快把学校的一切搬到根据地去。这一天，正是农历九月初一，漆黑的夜空，伸手不见五指。农民们燃起了火把，学校总务部门买来一批桅灯，附近的同学把家里各式各样的灯笼也找来了。这一支搬运大队，疏疏密密，象一条火龙在游动、一支游击战儿在行军。从樊家堡到刘家荡，大约二十多里路程，一夜间，两个来回，整个学校就被我们搬空了。

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刘家荡，一夜间搬来了一所学校，屋里屋外，满村是校具，满村是人，幸好有了“先遣部队”的筹划，用具的安放，食宿的安排，都能做到忙而不乱。两天后，经县里领导同志的实地察看，新的校址选定在刘家荡北面三华里的一个大庙——即王家园子西北角的观音庙。

学校从樊家堡搬到观音庙，这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变迁，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学校性质的根本变化。搬迁前她是国

民党政府办的一所旧学校，搬迁后，她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将改造成为民政府办理的新型学校。民政府对这所学校的到来十分重视，不仅在搬迁过程中给予物质上的、人力上的大力支援，还从搬迁之日起，民政府就发给了全体教职员工的薪给，并拨出专款修缮校舍。在区、乡政府的关怀下，安排师生生活，动员学生入学，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得以顺利的进行。

谁来做校长？杜干全同志仍然选中了前任校长张人俊。原来是国民党县教育局长的张人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主持抗日民政府办理的学校，这件事，生动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张人俊接受了民政府的聘请，很快从上海回到学校。刘锡康继续任教导主任，不少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如高季可、封提村等人应聘来校任教。民政府把这所学校称之为“泰兴一中”（同年暑期，民政府在常家庄新创办了“泰兴二中”，本部在常家庄，分部在顾庄寺，不久，二中又改为泰兴乡师。）从此，这所一九二五年创办，在泰兴城里办了十几年的老牌中学，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开始了她新的战斗历程。

艰 苦 的 岁 月

迁校后，在开学准备工作中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动员入学。

在迁校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贴标语、呼口号，有的还积极串联，动员同学们起来参加斗争。原来的学生会长，也接受了任务，主持斗争大会，按计划行事。但

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在当时的学生和家长中，由于阶级地位不同，政治思想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这在动员入学的过程中就充分表现出来。有些在斗争中表现得激昂慷慨的人，在到校复课这个问题上却趑趄不前了，原来在斗争大会上主持会议的那个学生会会长就发生了动摇。真正热心到根据地来上学的，倒是那些在轰轰烈烈斗争中默默无闻，而在搬运校具的实际行动中埋头苦干的贫雇农子弟，他们勤劳憨厚，朴实无华，对共产党、新四军无限信赖。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中年岁稍微大一点的人随时都有被反动派抓去当兵的危险，他们说：“我们不来上学，难道愿意在家里被抓去当和平军。”例如泰兴县政协副秘书长（现已离休）季作善、现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周立人（即周春和）、现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工作的周清和，还有后来参军在战场上牺牲的戴文益等人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学生。但当学校在樊家堡的时候，这种类型的学生只占少数，多数是学校周围农村里的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子弟，地富子女也占一定比例。他们有上学的要求，如今学校被新四军搬走了，顾虑重重，怕学校办不长，上了也是白费；怕鬼子下乡扫荡，路远不安全；怕学了不得回家，被弄去当新四军。因而好多人抱观望态度，迟迟不到校复课。地主富农家子弟，有的就躲起来不敢沾边了。那时在学生中还出现个别受敌人利用、进行造谣破坏的，说什么共产党还要把学校往北搬啦，要把学生编到队伍里去当小兵啦，等等。针对这些情况，县政府要各区、乡做思想工作，我们也依靠那些热心跟我们走的贫雇农子弟回乡做宣传，告诉同学和他们的家长，迁校是为了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是为了不让敌人夺走学校，要大家不要相信坏人的

谣言。经过一番工作，陆续来了一些学生。简师班的学生来得最多，因为他们学制只有一年，而且供给食宿，再读大半年就可毕业分配工作了。初中几个班级就少了，初一在樊家堡时分甲乙班，有一百多人，到校复课的还不到一半。在教师队伍里，迁校后也有了分化，除了我们几个人外，比较坚定地跟来的有封提村、王康德、桂庆和等人。朱剑华找来的个别政治面目不清的教师，早已溜之大吉。由于学生数较少，部分教师情绪不高，对学校前途缺乏信心。县长杜干全了解这一情况后，对刘锡康说：“政府坚决支持你们，那怕只有一个学生，也要坚持办下去。”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记得我当时教语文课，课堂里有时只有八、九个学生听课，但我自己编选教材，自己刻钢板、印讲义，从不马虎。学生见老师这样负责任，学习更加认真。他们中离家远一点的人大都是星期六回去，星期一天蒙蒙亮就背点小米面，挑一担麦秸草，赶上十几里路，准时到校上课。同庄的学生，三三两两结成伴，一个月化块把钱租金，住在学校附近的农民家里；家庭困难的一个人自炊，喝的是薄粥薄汤；多数是三、五个人结合起来集体烧饭，家境好一点的化几个钱请房东家代烧。偏僻的泰兴东北乡，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中学，这些贫农的儿子，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免费上学的日子，如今怎能不发愤读书，许多学生经常围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苦读到深夜。

几个月后，学校在周围农村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到第二学期，学生人数陡增，不少一、二十里以外的学生，也远道赶来上学，教室都坐得满满的了。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

代，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清乡”、“扫荡”。如何战胜困难，把教学活动坚持下去，这是我们在迁校后碰到的又一个大问题。

这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大批的投降，改编成伪军，出现了日、伪、蒋对解放区夹攻的局面。在苏中地区，敌伪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区“扫荡”，到处筑公路、修碉堡，仅在泰兴境内，敌人先后筑据点达五十个。在我们学校所在地观音庙的周围，敌人的据点北有大酒庄、西有孔家桥，东有杨村庙、严徐庄，南有谢家荡，最近的只有十几里路，这些据点的伪军，出没无常，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学校和附近的村庄经常受到骚扰，特别在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日伪出动更加频繁，在学生早读时，曾几次发现敌人出现在庄头，师生们不得不和群众一道到田野里躲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发生的鬼子抓走一群师生的事件。这天正是旧历的端午节，天还没有大亮，我们住在学校西首庄子上面的一个农民家里，只听得狗咬声、杂乱的脚步声闹嚷了一阵，原来是日军进了庄，直奔学校，敲开了大门，把煮熟的一锅粽子全吃光，将门窗全打坏，搜索了每一间屋子，最后把住在校内的师生工友全部带走了。在被抓走的人中，记得起来的有教导主任刘锡康，教师封提村、董石均，总务曹达海，工友王树青、季永康，还有三个姓桂的学生，总共有十多人。他们被几根绳子捆绑在一起，沿路推推搡搡一直被带到宣家堡，有的被关在土地庙里，有的被关在厕所里。苦头吃得最大的要算封提村。

封提村，是战争年代和我在一起工作了多年的亲密战友，当时他已是三十几岁的人了。他早年毕业于南通代用师范，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中学的语、数课程，他都教得很好，他爱好古典文学，《红楼梦》、《西厢记》里的许多诗词，他能背诵如流；他教学认真，批改作业、撰写文章、遣词用字十分严谨；对个别成绩差的学生，他从不放松，耐心辅导，深得学生的爱戴；他为人处世，耿直不依附权势，刚正且近乎迂呆。就在这次被日军逮捕后，他表现了 中国知识分子不可侮的骨气。日军问他附近的村庄名称，他佯装不知；日军要他把眼镜卸下，他偏要戴上。日军的铁蹄几次把他踢进了水塘，结果眼镜打碎了，下肢踢伤了，周身沾满了泥泞，他在敌人面前毫无惧色。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威武不能屈的泰兴人民的优秀儿子，二十五年后的十年动乱中，因为他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称刘少奇同志为刘主席，被认为犯了大罪，不堪高邮（当时他是高邮中学副校长）的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凌辱，含愤离开了人世。

封提村在路上吃尽了苦头之后，和刘锡康等四人（敌人认为他们是重要人物）一同关在一个厕所里。敌人把他们抓到宣家堡，给汉奸带来了发财的机会。被抓的人中有三个姓桂的，就是宣家堡镇上的人，后来，由他们的家庭出面，花钱买通了翻译，经当地乡绅具保全都释放了。

在这一期间，敌人的抢掠、骚扰，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有的学校被烧毁，还发生学生被杀害事件。为了缩小目标，有利于学生就近入学，把教学活动更好地坚持下去，经请示县政府批准，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把学校分散办理，用“学塾”这个名称来掩护。宣家堡以西的学生到封家集入

学，对外称“封村学塾”，实际上是泰兴一中的封家集分部，东边一带的学生，仍旧在观音庙入学，对外称“树人学塾”，实际上是泰兴一中的校本部。“封村学塾”由高季可、封提村负责，“树人学塾”由刘锡康和我负责。因为张人俊兼任公任中学校长，这时，他常住北洋庄，到公任中学主持工作去了。在两个学塾的班级上，也做了分散教学的打算，根据学生的分布情况，按地区建立了若干学习小组，平时集中上课，情况紧张时，分散开展学习活动。记得就是这年秋季的一天，敌人在学校附近抢粮，三个伪军到我们住的村子里找乡财粮员，这时张振玉正集中了一个组的初二学生教代数，伪军闯进来东张西望，翻翻书本，嘴里嘀咕了几句，也就走开了。

到一九四三年春，我军不断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情况开始有所好转。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学校教育事业也在前进，民主政府又在泰兴西部的张家河办起了泰兴乡师西分校和高师部，高师接管了旧省立第一临时师范后，统一命名为泰兴师范。树人学塾，封村学塾的名称取消，改为泰兴师范二院。从县立一中到泰师二院，在一年多的艰苦岁月里，由于县党政领导的重视关怀，全校师生茹苦含辛，艰苦奋斗，学校的教学活动一直坚持进行，从未间断。

我们的学校，从迁校斗争到胜利地在敌后坚持办学，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县长杜干全同志给予了无比的关怀。

当时中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是归分区领导的，在县里则由县长代管。泰兴县长杜干全，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把县中从敌人手中夺过来，就是杜干全同志的英明决策，并且由

他亲自指挥的。迁到根据地后，学校经费的使用，师生生活的安排，直到教师的聘请，碰到什么困难，他都亲自出面，帮助解决。具有真才实学的物理教师高季可先生就是他提名，要刘锡康去重金礼聘而来的。在反扫荡斗争紧张的时候，他要区、乡的同志和我们密切联系，互通情报，有什么紧急情况，只要有可能，他都直接派人来告诉我们。县政府机关移到学校附近，他总要跑来看看。他到了学校，不仅找领导同志谈问题，而且广泛接触群众，问这问那，做政治思想工作。他平易近人，到了哪里，就象一块磁铁，很有吸引力，使你乐于接近他，让你感到温暖。他是和我有过直接交往的第一位人民政府的县长，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四一年九月迁校斗争之前，经刘锡康同志介绍后，一见如故，每次遇见我和张振玉，总要开几句玩笑。一九四二年的年初，我们已经快结婚了，他来到学校，在一本纪念册上题词：“在斗争中恋爱，在恋爱中开展工作。”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当年艰苦的历程，杜县长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

我们在斗争中成长

抗日战争初期，在泰兴县城沦陷，新四军东进前后，这样一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而泰兴农村的中等学校却畸形发展，一度多达二十余所。我所在的县中仅是其中之一。这些学校，除抗战前就有的县中、黄中和新四军东进后新办的县二中（不久改为泰兴乡师）外，记得起来的有为纪念张公任而办的设在北洋庄的公任中学，办在霍家庄的宏才中学

(后改为省职业中学简称霍职中)，办在老叶庄的省四临中(后来搬到鞠家庄改称鞠庄职业中学)，还有办在安乐桥的苏北中学，办在新镇市的新建中学，办在杨村庙的建国中学，和在湖头的建国中学分校，还有沪光中学(先在泰兴城，县城沦陷后迁至曹家市)、博罗中学(在张文匡)、仲源中学(办在古溪后迁至泰县)、溪光中学(在顾庄)、侨光中学分校(在横巷和王家厂头)、醒华中学(在薛家垛)、柴墟中学(在口岸)、黄中分部(在唐家港)、育华中学(在清水潭)、一临师(在樊家堡、封家集)、四维中学(在野竹园)，还有无锡师范分校(在小赵庄)……等等。在一个短时期内，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校争先恐后的办到泰兴来？主要因为战前泰兴在外地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比较多，城市沦陷，他们便纷纷回到家乡，有的就沿用原所在学校的牌子继续办学，谋取一个栖身之地。当然这些回乡人员的情况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是有政治背景的，城市被日军占领，某些国民党顽固分子，在城里站不住脚了，就把学校作为他们的立足点，既可安排一些跟他们走的人，也好和共产党争夺青少年，继续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勾当。

这么多的学校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在新四军东进以后，由民主政府创办的，如县二中，即泰兴县立师范(后改为泰兴乡师)，党的基础比较强，是贯彻抗日民主教育的新型学校。二是原来国民党政府办的公立学校或是过去在国民党政府立过案的私立学校，这是多数。在这些学校中，有的掌握在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手里，如泰兴县中，东进后不久便迁到根据地办理；又如仲源中学和溪光中学负责人是汪左白；博罗中学的负责人是刘伯厚。当时，他们都是党的统战